



#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上

黄宣民 陈寒鸣 主编



卷之三

新嘉坡(1910)日興株主年會  
新嘉坡(1910)日興株主年會

卷之三

卷之三十一

• 第二章 市场化与制度变迁：中国农村改革研究（1978—2008）

# 中国儒学

# 发展史 上

之江風雨錄·卷之三·附錄·附錄詩文

©2001-2002 SYNTROPY-010. All rights reserved.

(5) L-12 C-2013-010, P VI

(97) 民主中國大會北進（附）

（1921）年，王國維在《宋元詞》中說：「周邦彥之詞，其間有以爲詞者，亦有以爲詩者。」

（三）日本の政治と社会

新編 金匱要略 卷之三

（總理）請問你這事是誰的主意？

本院所长，特此通知，并图示之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儒学发展史·上/黄宣民,陈寒鸣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034—2271—3

I. 中… II. ①黄… ②陈… III. 儒家—思想史—研究—中国 IV.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818 号**

---

**责任编辑:韩军**

---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http://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32

字 数:220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28.00 元(上、中、下)

---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本书分撰人

(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启发 陈寒鸣 陈其泰 吴 锐 张海晏  
张 践 张克伟 张文修 姜广辉 贾乾初  
黄宣民 梁 涛 萧 纲 惠吉星 欧阳万钧

# 序

刘泽华

近日，陈寒鸣同志携来一捆书稿，说是请我审看，并十分诚恳地请求我为之作序。我打开一看，眼睛为之一亮，这不是我的老友黄宣民教授领衔主编的《中国儒学发展史》吗？这不是在宣民去世后，我时时挂念并询问着何时才能将之整理、增补、修改定稿并想方设法地使之出版的《中国儒学发展史》吗？为这书作序，我当然是义不容辞、并且十分乐意去做的了。

屈指算来，我与宣民有 30 多年的往来和友谊。宣民自大学后到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思想家侯外庐先生领导的群体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更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做外老的学术助手，帮助外老做了大量工作。他深受外老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影响，堪称深得外庐学派之精髓。而我尽管无缘列入外老门墙，但外老的《中国思想通史》对我以及我们这辈治中国思想史者是有很大影响的。这使我与宣民之间必然会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他对我有很多的激励和揄扬，而我从他那里也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启示。犹忆 1991 年春、夏之际，我在南开大学主持召开了一次规模虽不很大、但与会者却很有代表性的全国性中国政治思想史学术研讨会。宣民与其同门师兄、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的林英研究员（林先生即为外老《中国思想通史》合作者“诸青”中之一员）一道欣然赴会。林英和宣民不仅在会上发表了他们各自的高见，令与会者多有耳目一新之感，他们又都对我主编并刚出版面世不久的《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给予很高评价，并都对我当时正着手进行中的主编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工作寄予了厚望，而且，宣民更在他的学术讲演中指

出：“在我们这一辈学者中，刘泽华先生是很有成就、很有思想的。如果说他有什么学术派别的归属的话，他与他的合作者的思想和学术研究成果可归之于‘侯外庐学派’，因为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政治思维》这部书看，还是从刘先生一贯的学说思想、学术主张看，他们都是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自觉地运用、并且是发挥性地运用了外老的治学方法，发展或至少是引申了外老的学术思想的。当然，正因为他们、特别是刘先生有了自己创造性的发挥或发展，故而刘先生本人及以他为核心的学术群体所取得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中，又具有了与外老、与外庐学派不甚相同的自身特色。我为之而高兴。衷心期盼独具特色和个性色彩的‘刘泽华学派’的早日形成并发展壮大！”我听了他们、尤其是宣民的这番品评之后，深感愧疚之外，又觉得他们、特别是宣民是深知我的。

其实，宣民知我，我又何尝不知他呢？我不独深知宣民为人笃厚、治学勤严，而且深知其在外老生前生后均以绍述、承继乃至弘扬外老学说思想和外庐学派优良传统为担当。仅就我个人所知，近20年来，宣民有诸多的学术规划，如研究和撰著《理学与社会生活》、《泰州学派》、《金华朱学》等等，而《中国儒学发展史》则是其重要规划之一。惜乎其享年不永，这些计划均未能完成。这不仅是宣民本人的遗憾，而且也是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我早就知道寒鸣同志是宣民和姜广辉二位的学生。他虽然未曾接受过专门的高等教育训练，但在宣民和广辉二位的精心指导和培养下，加以他个人的刻苦努力，逐渐积累起史学根基，并在中国思想史、尤其是明代儒学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他除了发表有百余篇学术论文外，还先后出版了《中国文化史纲》、《中国理想社会探求史略》上下卷和《企业文化简论》。我也曾邀请他参加我所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三卷的撰写工作。如今，在宣民去世后的几年间，寒鸣同志在自身工作颇繁，他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家庭负担因而较重、心理压力很大的情况下，怀着对其师门的敬意而承继着宣民的未竟之业，将《中国儒学发展史》整理、增补了出来，竟成

了一部 200 万言的煌煌巨著。我很为这项工作的完成而高兴，更觉得此书之出版足可告慰亡友宣民的在天之灵了。

我将书稿大体翻看了一遍，比较认真地阅读了“绪论”及其他部分章节，觉得这部《中国儒学发展史》至少具有两大主要特点：其一，继承、发扬了侯外庐先生的基本学说思想和外庐学派的治学方法。就前者来看，如运用外老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认识及其对中国古代社会文明产生路径所作的分析来讨论儒学的起源、儒学的生存土壤，作出了于史有据、令人信服的判断。对于先秦儒学、汉代神学化的经学思潮、宋明以道学为主体的儒学以及晚明清初的早期启蒙儒学等等的论析，也大都在沿承外老学说思想的基础上而能有所发展，从而使这部书具有自身的特色和学术价值。就后者来看，侯外庐学派素以既重理论、又重史料，提倡实事求是的笃实学风著称于学界。这部《中国儒学发展史》保持并突出地显示出了这一治学风格。读者只要稍阅此书便不难发现，其中的观点多非凭空杜撰出来，而是建立在大量资料基础上的。这一特点散见于全书各章节，是无需在此举例说明的。因此，我以为这部《中国儒学发展史》同广辉先生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一样，继承并发展了侯派的优良传统，堪称“后侯外庐时代”侯派的代表性著作。其二，关注考古新发现和学界研究现状，并通过自身努力发掘出一些新资料，增加了一些以往不甚为人所关注的新人物、新论题，从而为人们展示了一幅更加丰富的儒学形成发展的历史画卷。譬如，郭店楚简是近年新发现的战国儒学资料，它一经披露，即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重视。本书设专节对之予以论析，无疑使先秦儒学、尤其是思孟之儒的真貌得以展示了出来。又如，如果说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那么，儒家经学则在儒学中占据核心性的重要地位。近年学界很重视儒家经学的研究；姜广辉聚集并领导着志同道合者更于此最为着力，并已出版了《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一、二卷，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中国儒学发展史》的撰著者们充分注意到了学术研究的这一现状，并从将社会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有机融为一体的角度

(而这又正是外老和侯派的重要治学特色之一) 将儒家经学依时代运演而分成先秦元典经学、两汉神学化的经学、魏晋南北朝隋唐的注疏经学、宋明道学化的经学、晚明清初早期启蒙经学、清代朴学化的经学、近代西学化经学诸思潮，并经过深入研究将其中的大部分分别撰写成专节，复在这种背景下，对一些重要经学人物及其思想如汉代的郑玄、宋代的程颐和朱熹、元代的吴澄等进行详析，分置于各有关章节，而若将它们汇聚到一起，则似可形成《中国经学思潮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精神》。这几节，读来很使人得到有益的启迪。我以为，倘若据之而有所扩充，撰成一部《中国经学思潮史》的专著，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此外，南宋时期的唐仲友、明代初中叶的程敏政、明代中后叶的颜山农及晚明的鹿善继等，则是以往学术界研究得很不充分的历史人物，而《中国儒学发展史》则均有详论，这使该书具有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意义。

总之，我认为，这部《中国儒学发展史》的最终完成并公开出版，不仅对于已经亡故的老友宣民有纪念意义，而且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当能起到进一步推动学界更加广泛而又深入地研究儒学的作用。我在高兴地看到这书行将问世的同时，又很希望寒鸣及其同门们再进一步努力一下，将宣民公开发表过的或未公开发表过的文字整理一下，汇聚成书并将之出版，这不仅有助于人们了解宣民其人其学，而且对推动乃至深化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也一定会有所裨益。此为我之所望，亦为学界所盼也。

是为序。

2005年4月于天津

# 目 录

上

序	刘泽华	(1)
结论		(1)
一、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儒学演进		(1)
二、经世致用：儒学基本特征举析之一		(10)
三、不断创新和自我改造：儒学基本特征举析之二		(25)
四、儒家伦理与宗法社会		(34)
五、从传统到现代的考察——以儒家“民本”传统为例		(46)
 第一章 孔子和早期儒学		(117)
第一节 上古礼乐文明与原始儒学		(118)
附录一] 从巫祝文化到礼乐文明的历史转变		(137)
[附录二] 神守、社稷守与“儒”及儒家的产生		(148)
第二节 西周王官之学的确立及其衰微		(166)
第三节 齐鲁文化与儒学的诞生		(177)
第四节 儒家开山祖孔子与六经		(188)
第五节 孔门弟子与早期儒学的传播		(215)
[附录一] 颜回与“颜氏之儒”探微		(232)
[附录二] 论孔门后学的分化		(240)
第六节 思孟学派及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		(257)
第七节 郭店楚简与战国早期儒学		(275)

[附录一] 郭店楚简与《中庸》	(301)
[附录二] 郭店楚简与“君子慎独”	(327)
第八节 荀卿学派及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	(336)
<b>第二章 秦代的儒生与儒学</b>	(363)
第一节 秦初的文化政策与儒生的任用	(363)
第二节 秦代刻石及简文所见的儒家思想	(374)
第三节 秦代儒生的仕学分化与儒学的官私并存	(381)
第四节 “焚书坑儒”与先秦儒学的终结	(386)
<b>第三章 汉代儒学：封建社会官方儒学的建立</b>	(391)
第一节 汉代儒学复兴及其历史地位	(392)
第二节 “天人三策”：武帝对儒学的选择	(408)
第三节 皇权与经学——儒家经籍的法典化	(438)
第四节 神学化的经学思潮	(451)
[附录] 汉儒谶纬神学中的科学内容	(466)
第五节 儒学的神学化与汉儒的造神运动	(474)
第六节 今古文经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影响	(493)
第七节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理论体系	(517)
[附录] 《春秋》与西汉社会生活	(550)
第八节 《孝经》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	(563)
第九节 政治经典与经典政治：《周礼》与古代理想政治	(583)
第十节 郑玄《三礼注》及其儒学史意义	(614)

## 中

<b>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儒学</b>	(663)
第一节 经学与玄学	(664)
第二节 南朝玄学的蜕变与礼学的复兴	(690)

第三节 北朝少数民族的汉化及儒学的汉学特色	(703)
第四节 注疏经学	(711)
第五节 隋唐科举制与儒家义疏学的进一步发展	(719)
第六节 唐中叶及其后儒学发展的新迹象	(744)
第七节 敦煌儒学	(767)
<b>第五章 道学兴起与两宋儒学</b>	(784)
第一节 “庆历新政”与宋学的开端	(784)
第二节 “道学”、“理学”、“心学”定名缘起	(788)
第三节 儒学趋向的转化：义理之学的兴起	(796)
第四节 荆公新学的特点及其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814)
第五节 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831)
第六节 苏氏蜀学学风与东坡易学	(869)
第七节 书院儒学教育	(890)
第八节 朱熹集大成的心性学说	(908)
第九节 理学化经学的典范：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927)
第十节 陆学的立世精神	(952)
[附录] 朱熹与陆九渊的学术争论	(967)
第十一节 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与唐仲友的经制之学 ——南宋与道学相异趣的事功之学思潮	(975)
第十二节 “学圣”与理学在儒学史上的特殊贡献	(1052)
[附录] 宋儒孟子观述论	(1071)
第十三节 道学化的经学思潮	(1090)
第十四节 《伊川易传》的特色及其意义	(1107)
第十五节 北宋儒者文士与党争	(1122)
第十六节 南宋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1176)
<b>第六章 辽金元时期的儒学</b>	(1186)
第一节 辽、金统治者对儒学的尊崇及金朝儒学的特色	(1186)

第二节 西夏遵行儒学，“渐行中国之风”	(1192)
第三节 元代“用夷变夏”思潮与理学的官学化	(1195)
第四节 金华朱学的主要特点和历史影响	(1206)
第五节 元代的朱、陆合流和陆学	(1237)
第六节 吴澄的“道统”论与经学	(1243)
[附录] 元儒吴澄对《礼记》的改编	(1248)

## 下

<b>第七章 明代儒学</b>	(1267)
第一节 朱元璋与洪武儒学	(1267)
第二节 朱棣的儒学思想	(1334)
第三节 朱学流变	(1347)
第四节 程敏政及其朱、陆“早异晚同”论	(1363)
第五节 王守仁心学及其对儒学的革新意义	(1405)
[附录] 阳明心学兴盛原因探析	(1414)
第六节 阳明心学与封建政治	(1424)
第七节 阳明哲学的视角	(1434)
第八节 王艮的“百姓日用之学”	(1450)
第九节 平民儒者颜钧及其“大成仁道”	(1480)
[附录] 《颜钧集》与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	(1511)
第十节 泰州王门巨——孽王一菴的哲学思想	(1522)
第十一节 韩贞的平民儒者风范与罗汝芳的理学思想	(1537)
[附录] 罗汝芳的平民儒学思想及其讲学实践	(1552)
第十二节 泰州王学后劲焦竑	(1576)
第十三节 袁宏道与泰州王学	(1590)
第十四节 诸种思潮交汇下的汤显祖的思想	(1612)
第十五节 张居正与阳明心学	(1624)
第十六节 王湛心学与书院教育的再度辉煌	(1646)

第十七节 晚明儒者文士的“狂者胸次”	(1657)
第十八节 鹿善继与燕南王学	(1668)
第十九节 戴山心学与晚明思潮	(1720)
第二十节 晚明清初的名节思潮	(1766)
<b>第八章 蕴综汉宋的清代儒学</b>	(1781)
第一节 黄宗羲与清初启蒙儒学	(1781)
第二节 傅山“异端”思想的风骨	(1792)
第三节 顾炎武与清初学风的转变	(1809)
第四节 李颙与清初山林儒学	(1824)
第五节 康熙帝与清初庙堂儒学	(1832)
[附录] 庙堂理学的政治思想	(1841)
第六节 乾嘉汉学及其对儒学发展的重大贡献	(1852)
第七节 朴学化的经学思潮	(1878)
第八节 戴震披着“经言”外衣的启蒙学说	(1895)
[附录] 戴震与中国早期启蒙思潮	(1912)
第九节 袁枚对正宗儒学传统的批判	(1922)
第十节 崔述与清代疑古儒学	(1937)
第十一节 晚清公羊学的兴起与康有为的维新思想	(1972)
第十二节 谭嗣同的“冲决网罗之学”	(1990)
第十三节 西学化的经学思潮	(2004)
第十四节 儒学在近代中国的命运及其前瞻	(2021)
[附录]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历程	(2040)
<b>结束语：关于儒学的现代发展问题</b>	(2051)
后记一 陈寒鸣	(2074)
后记二 黄勤	(2083)

# 绪 论

## 一、中国：社会变革与儒学的演进

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中国最古老、悠久、博大而且最富影响力的学派。这个学派源远流长，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历史上，儒学诞生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而儒学也是上古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王夫之《礼记章句》疏云：“此节言自后圣修火政以来，民知饮食则已知祭祀之礼，致敬于鬼神，一皆天道人情之所不容已，其所从来者远，非三代之始制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在原始社会中已有礼乐的萌芽，礼乐并非始于夏、商、周三代，而是人类文明长期演进的结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虞时代已初具礼乐，如：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夔典乐，教胄子，习诗歌。但五帝时代仍属于前礼乐的神守时代。

所谓“神守时代”，即是今所通称的巫祝文化时期。因为中华文明像许多古老文明一样，也经历过原始宗教时期，或者称为巫祝文化时期。新近发现的辽西红山文化，有五千年前巨大的神庙遗址；与红山文化时代上下相近的浙江良渚文化也出土了大小祭坛和大批供祭祀用的玉器，这都足以表明上古巫祝文化之盛。据《国语·楚语》记楚大夫观射父的话，上古巫祝文化经历了“民神不杂”~“民神杂糅”~“家为巫史”，“绝地天通”三个阶段。其中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从神守到社稷守的历史转变时代。大体说来，三代以前即是巫祝文

化期，夏、商、周三代则是礼乐文化期，尤以西周为极盛。周初封建诸侯，周公制礼作乐，造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礼乐文化是从巫祝文化演变而来，故在礼乐文化中保留了巫祝文化的残余，甚至在后起的儒学中仍有明显的巫祝文化痕迹和影响。孔子虽然不语怪、力、乱、神，但“立卜筮以质神灵”的古老传统，仍然被多少保留在儒学的传统之中。

侯外庐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路径是：由氏族而家族而国家，而且国家混合于家族之中，形成以王权为中心的氏族贵族专政。这一历史特点，决定了上古礼乐文化的性质与特征：（一）礼乐为氏族贵族所专有，并形成为国家政治制度。所谓“器以藏礼”，“政之大节”（《左传》成公三年），说明礼器是王公贵族地位与权力的象征，故“国之重器，不可以假人”，须“子子孙孙永保用”；故“礼不下庶人”，权力不得为非特权者所分享。但礼乐对于统治者而言，在威仪之中似乎亦有某些监督作用。如周召公曾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史记·周本纪》）在西周时代，不仅国家重器为氏族贵族所专及，连同典礼乐、掌卜史的人也都归氏族贵族所掌握。例如，宗周分封诸侯时，往往是把土地、民人与祝、宗、卜、史一道授予受封者的。（二）礼乐“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所谓“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上引均见《史记·乐书》）。礼乐成为社会政治伦理的衡尺。如周武王革殷命时，曾宣布殷纣王三条罪状，即：（1）殷废先王明德；（2）侮蔑神祇不祀；（3）昏暴商邑百姓。这三条就是以维护宗庙社稷、尊奉礼乐而提出来的，也是后来宗周敬天法祖、明德保民思想的依据。与此同时，礼乐用于宗庙社稷，又产生了美轮美奂的古代宫廷贵族文化。（三）礼乐传授在官府，亦即“学在官府”。《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朱熹注解说，庠、校、序皆乡学，而“学，国学也”。宋李觏说：“古者家有塾，党有序，术

有序，国有学，为民立师也。”（《广潜书·十五》，《李觏集》卷第二十）章学诚认为，古人治教未分，官师合一，以官为师，以吏为教，如“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文史通义·原学中》）。因为官学中有司徒、师儒等教授礼乐，故《易》、《诗》、《书》、《礼》、《乐》这些古代经典，也是通过官学系统流传下来的。（四）礼乐文化典籍，如《易》、《诗》、《书》、《礼》、《乐》，兼具神、天（自然）与人文，典章制度、仪表仪规与文化素养、思想风范等等，包罗万象，知识丰富，这是儒学赖以滋生的深厚土壤。若无此土壤，儒学的发生是难以想象的。（五）在诸侯国中，礼乐文化的发展并不平衡，其中以鲁国最为完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43 年），记吴季札观周礼于鲁，其所见有周乐，有德康叔、武公之《卫风》，有表太公之《齐》，而闻歌《秦》则听夏声，歌《唐》则思陶唐氏等等，确乎是集大成了。昭公二年（前 540 年），晋韩宣子来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赞美“周礼尽在鲁矣”！《庄子·天下篇》也说：“《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可见，《易》《诗》《书》《礼》《乐》等古代经典，便是儒学的本源，而邹鲁缙绅先生则是儒家的先辈。

儒学作为中国最古老、最博大和最有影响的学派。两千多年来，它以其浩瀚的典籍构筑了中华学术的宏伟殿堂；又以其“经世致用”的精神而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子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圣人，儒学成为中国古老文明的主要象征。

儒学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地改变其自身。社会变革对于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反之，儒学在其演变中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变革。

（一）由周平王东迁而开始的春秋时代（前 772—前 476 年），就是所谓“礼坏乐崩”的社会变革时代。从西周建立起来的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封建宗法制度，此时已发生了动摇和分化：一是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连绵不断，促使大国间相互争霸（如“五霸”），周天子的威权与中心地位日渐式微；再是由于财产所有权的多元化，导致公室分裂；政治权力下移出现“陪臣执国命”的局面。然而，无论小国被

兼并，抑或公室分裂乃至国君被弑，都使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礼乐制度开始崩坏，于是，原来在官学中教习诗书礼乐的“师儒”们不能不离开官府而流向四方。《论语·微子》就曾讲到鲁国宫廷乐师们流失的情形：“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据说，襄即是孔子学琴的老师。由此可见，礼乐崩坏的结果是文化下移，许多没有贵族身份的“庶人”（平民）反而有了接受贵族文化诗书礼乐的机会，从而为私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清代学者汪中在《述学》中也曾讲到春秋战国时代学术下移的情形，他说：

古之为学士者，官师之长，但教之以其实事，其所诵者，《诗》《书》而已。其他典籍，则皆官府藏而世守之，岂闻无有也。……其所谓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外此则乡学小学而已。自辟雍之制无闻，太史之官失守，于是布衣有授业之徒，草野多载笔之士，教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诸子各以其学鸣，而先王之道荒矣。古人学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业。官既失守，故专门之学废。

官学废了，私学兴起来了。孔子（前 551—前 479 年）开创的儒学，就是当时首家私学学派。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之众。他教弟子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而以礼乐为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但是，孔子所注重的，不止是“陈俎豆，设礼容”这些形式，更主要是礼的思想文化内涵。孔子熟悉夏、商、周三代礼制的因革损益，更钦慕盛极一时的西周礼乐文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即以其绍继者自许。

孔子还以其渊博知识整理古代文化遗产，阐述《易》、《诗》、《书》、《礼》、《乐》、《春秋》，号称《六经》。经过孔子的笔削手定，《六经》变成了儒学经典，孔子也变成了古代礼乐文明的集大成者。

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是礼和仁，或称之为礼学和仁学，二者是互相联系的。礼学是孔子对于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但他又不拘守于礼制的某些形式，而对之加以修正，更充实以仁的精神，从而使礼